

	一	二	七	丁	三	万	
甲骨文	一 粹一期 粹六七八九 粹四期 粹元六	二 菁一期 菁三二 粹三期 粹三三	十 前一四一期 前五二六 佚二期 佚四。	丁 一期 甲三三九 五一期 后上三三 粹二期 粹五九	三 粹三期 粹六六 粹四期 粹三七 粹五期 粹四七六	三 菁五二 二二 先周 周甲一	
銅器銘文	一 孟鼎 周早 一 毛公鼎 周晚 一 秦公 春秋	二 孟鼎 周早 二 留鼎 周中 二 秦公 春秋	十 小孟鼎 周早 十 趙鼎 周中 十 大梁 戰國	丁 作冊大鼎 周早 留壺 周中 卷減鐘 春秋	三 於賜鐘 春秋	三 天亡段 周早 二 史頌段 周中 二 段 周晚	万 周早 同萬 說文无 集韻
簡書及其它刻辭	一 盟書二六三 戰國	二 盟書二四 戰國 二 陶 秦公十三三 戰國		丁 印待時 戰國 陳簋 戰國	三 印拳 戰國 陶文編西九六 戰國	三 盟書二五 戰國 三 印魏石 戰國	万 印泉綬 戰國 万 凝清 戰國
秦篆	一	二	七	丁	三		

古文字類編

高明編 1980年11月 北京 中華書局
16開 782頁 報紙 柯式印刷 索綫訂 精裝

集先秦文字成書者，已有近二千年的歷史。東漢許慎撰《說文解字》，從壁中書及《史籀篇》中采集古文、籀文異體七百餘形，開後人集先秦文字之先河。其中於小篆之次別出古文籀文之例，對後世影響尤大。清末吳大澂專集殷周金石文字，以補古籀之缺，成《說文古籀補》一書。吳書收字盡據拓本，分別部居悉依《說文》，疑似不可識者則別為附錄待問。此三者，成為後人編製字書之法門。當代影響較大之古文字字書，如容庚先生《金文編》，商承祚先生《殷虛文字類編》，顧廷龍先生《古匋文彙錄》、羅福頤先生《古璽文字徵》，孫海波先生《甲骨文編》，金祥恆先生《陶文編》等，無一不在吳書的影響下蔚成大觀。可是這類著作都側重於某一類器物上的文字，類別既繁，重複又多，其中有的成書年代較早，目前甚少流傳，多數已不能反映考古新發現和學術新成就了。因此，對於一般文史工作者來說，尤其需要一種新的綜合性的古文字字書。

北京中華書局出版高明先生的《古文字類編》，是目前所見較為完備的綜合性字書。全書分為三編。第一編為古文字，收可識單字三千多個。每字通分四欄：首欄為商殷甲骨文，按五期排列；次欄為商周金文，兩周部分也以五期相次；三欄為春秋戰國金文以外的其它古文字；最後一欄為秦篆。第二編為合體文字，收合文三百餘種。每種分上中下三欄：上欄列甲骨文中的合文，中欄列金文中的合文，下欄列見於其它文書的合文。第三編為徽號文字，收圖形文字五百九十餘組，僅見於甲骨文及商、周早期金文，故分上下兩欄排列。書後附引書目錄、引器目錄及檢字索引。總共七百八十餘頁，犖犖大觀，堪稱巨制。同以往字書比較，《類編》有下面幾個特點：

(1) 綜合群書，羅列異體。先秦古文字散見於諸家著錄，某家字書，也僅從某個側面反映古文字的局部而看不到它的整體。《類編》則不同，所引書二百三十多種，引器一千五百六十多器，並不以某一類別為限。收字更不限於甲骨文或金文，無論石刻、竹簡、帛書、載書、符節、璽印、陶器、泉貨等文字，概在網羅之列。全書收已識單字

三千零五十六字，有些單字，包括同時和不同時的異體在內，多達一、二十個，最少的也有三、四種，連同重文計算，總共收一萬七千零五個形體。大凡已發現的古文單字及其重要異構皆略備於是編之中。

(2) 考古新獲，廣為吸收。近二、三十年來，中國考古在各方面都有重要的發現。以銅器為例，二十多年來新發現的青銅器約六百器，銘文近八百種，可增收單字達四百多個。僅中山王壺器中未見於箸錄的形體就有一百四十九個之多。還有一些未經正式發表的文字資料，如湖北望山和天星觀戰國楚簡文字，編者都盡可能加以蒐羅，並充分吸收到《類編》中來。

(3) 分欄繫字，嬗跡可尋。《類編》三部分均採取分欄繫字：欄格以時代先後為序，繫字按形體早晚相次。如此，則一字在不同時期的遞變之跡，便歷歷可尋。以往的文字史書，總是從甲骨文、金文一躍而到秦篆，對於文字變化最為激烈之春秋戰國時代，苦於缺乏具體材料，往往語焉不詳，中國文字變遷史缺了重要的一環。《類編》把零星分散的戰國文字資料匯於一欄，填補了這一歷史發展中的空缺。人們不但可以看到某個漢字自甲骨文至秦篆之間前後聯貫、一脈相承的演變，而且可以了解整個先秦文字新陳代謝的簡單歷程。這可說是本書的一大貢獻。

此外，本書在單字的編排方面試圖建立一套符合古文字自身特點的新體系，這是前人未嘗做過的，從不滿足於“始一終亥”的舊體系來說，這種嘗試也是有積極意義的。可惜編者沒有說明這個新體系的具體內容，我們也無從知道編者根據什麼原則確定三千多個單字的先後序列，即使讀者能自悟其有暗默之統系存在，也不容易充分理解。如把丁、丙、世三字置於“一”部，主字歸入“王”部，必字則從“心”部，都與古文字形體遠不相侔，令人十分費解。又書中同字復出之例甚多，如并字既歸“人”部（十七頁），又入“井”部（三七四頁）；求字既入“衣”部（三五四頁），又見“水”部（四六零頁）；舍字既在“宀”部（七頁），又出“口”部（一二五頁）；鳴字則於“鳥”部（二二五頁）及“口”部（一二九頁）互見。凡此種種，書中均未作任何說明，令人無所適從，且復出之字所收字例也不盡相同，容易使人誤為二字。如真正按古文字特點歸類，後者實無重現之必要。

本書另一個比較突出的問題是檢字難。由於《類編》試圖建立新的體系而於序列中又未加說明，讀者不能自覺運用這個體系於檢字，因此每查一字，必靠索引，而索引之畫數又頗不規則，常常帶來不必要的麻煩，如八畫的“亞”字，索引編在十畫，翻至正文，却是簡體的“亚”，竟又變成六畫了，類似情況並不少見。

總之，《類編》儘管還存在某些尚待改進的問題，仍不失為一部有學術價值又切合實用的工具書。“創業維艱”，要把多年來考古發現和學術研究的成果綜合成一部字書，是要解決許多帶全局性的理論問題的。《古文字類編》和《漢語古文字字形表》的相繼出現，標誌着中國古文字研究的新動向——正在向綜合研究進軍！這確是一件值得大書特書的大事。

曾憲通